

# 羊舌氏家风与叔向文学活动的文学史意义

赵逵夫, 田有余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晋国叔向以博学多识、工于辞令而闻名,《左传》《国语》记载了其文学活动。叔向善于赋诗、引诗,其诗学活动助力了《诗》的经典生成。叔向的言辞观表现为“辞不可以已”、须合乎礼制、“信而有征”等,其言辞观是儒家政教功用论文学思想的先声。叔向的外交文辞、政论文辞、论谏文辞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学价值。以叔向为代表的春秋卿大夫们的文化、文学活动,是战国诸子著书立说活动的上源,也为屈原、宋玉等卿大夫文学家的活动开了先河。

**[关键词]** 叔向; 卿大夫; 辞令创作; 文学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21)01-0068-11

**[DOI]** 10.16783/j.cnki.nwnus.2021.01.008

春秋中晚期,卿大夫阶层逐渐取代东周王室和诸侯,成为政坛的新生主导力量。诸侯国卿大夫活跃于各种政治场合,他们谋政主政,领兵征伐,参与祭祀、策命、结盟、朝聘、宴饮等仪式性活动,逐渐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同时,卿大夫阶层中很多人也成了文化、文学活动的主体。他们搜求、整理文化典籍,据礼论道,在政治实践中赋诗言志、赴告策书、交接对答、讽喻规谏、撰写辞章。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卿大夫的文化、文学活动最能体现“一个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sup>[1]</sup>(P71)的特征。一批诸侯国卿大夫因熟悉典籍、明于礼制、善于应对、长于赋诗、工于辞令而为人称道,晋国上大夫叔向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拟以其为例,考察春秋卿大夫的文学活动及其文学史意义。

## 一、博学多识的叔向及其家风、家学

羊舌肸,字叔向,一作叔嚭、叔誉,羊舌氏食邑于杨,故文献中又作杨肸、叔肸,生活于晋景公(前599—前581)、厉公(前580—前573)、悼公(前572—前558)、平公(前557—前532)、昭公(前531—前526)时。羊舌肸文献中多作“叔向”,称字,同郑国的公孙侨文献中多称“子产”一样,

反映了当时及后人对他的崇敬与仰慕。如《国语·晋语七》载:

(晋)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司马侯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sup>[2]</sup>(P415)

司马侯言“羊舌肸习于《春秋》”,称名,是大臣向国君述事中言及,只能称其名。末尾的“召叔向使傅太子彪”,是《国语》编撰者或者说是史官的语气,称字,以表示尊敬。这同《论语》中记述者提到孔子弟子都称字,而所记孔子语中称弟子全称名的道理一样。司马侯说的“春秋”,徐元诰《国语集解》注“为诸侯国史之别名”<sup>[2]</sup>(P415)。叔向熟悉各国历史,方能以史为鉴。“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是说诸侯的所作所为天天出现在国君的身旁,要效法其善行,对其恶行引以为戒。司马侯认为叔向是具备这方面德义学养的,可见对叔向的推崇。

叔向以博学多识、长于辞令而闻名于诸侯间。《国语·楚语上》载楚国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提到用“春秋”“世”“诗”“礼”“乐”“令”“语”

**[收稿日期]** 2020-11-16

**[第一作者简介]** 赵逵夫(1942—),男,甘肃西和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故志”“训典”等九类文献<sup>[2]</sup> (PP. 485—486)。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说苑》《新序》所载叔向文辞征引文献看，引《诗》13次、《书》2次、《讒鼎铭》1次、前贤嘉言善语4次，可见他对春秋以前重要典籍和文献的熟悉。晋悼公任叔向为太子之傅，表明对其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正直忠厚品质的认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

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子木与之言，弗能对；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对也。<sup>[3]</sup>  
(P1133)

子木是楚国有能力、有声望的令尹屈建的字，赵孟指晋国赵武。赵武不能应对屈建，而屈建又不能对答叔向，叔向之有思想、有能力、对当时列国形势有全面的了解又娴于辞令可知。《左传·昭公五年》载晋国上卿韩起护送晋女到楚国，叔向为副手。楚灵王“厚为韩子礼。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礼”<sup>[3]</sup> (P1269)。楚灵王想刁难叔向，肯定会听取楚国通人的建议，做充分的准备，以达到杀威的目的，竟然没有成功。叔向的博学多知由此可见。

春秋时代承西周之制，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利享受较系统的良好教育。其时，礼崩乐坏，贵族在世袭世禄制度下，享有富贵的特权，所以很多贵族子弟养尊处优，缺乏上进精神。只有那些有较好的家风、家学传统的贵族之家保持勤读书、重典籍的传统。《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周大夫原伯鲁与人交谈中明言“不说（悦）学”。鲁贤臣闵马父说：“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按指“不学”之说），而后及其大人（按指影响及在位者）。”<sup>[3]</sup> (PP. 1397—1398) 闵马父认为原伯鲁“可以无学，无学不害”这种思想意识的漫延，将导致周室的内乱，但如闵马父、叔向这样为国家、社会和百姓考虑问题、有思想的贵族毕竟太少。

叔向是春秋时晋国有能力的贤大夫。其曾祖羊舌大夫曾为太子申生军尉，当在晋献公之时（《左传·闵公二年》）。其父羊舌职在晋景公至晋悼公时为大夫（《左传·宣公十五年》至《左传·襄公三年》），后为佐中军尉（《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景公时，正是晋国在晋文公之后国内稳定、发展最好之时，羊舌职以德义之事称誉君王，也体现出很高的见识和个人的素养，表现了对于晋景公振兴晋国大计的真诚支持。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补叙叔向年青时一件

事：“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以其貌美，其母知申公巫臣家旧事，无德而坏家国，又举古有仍氏女之事，以证“甚美必有甚恶”，“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之理。“叔向惧，不敢取”，但晋平公“强使取之”，后来也终为羊舌氏招祸乱。这里反映出羊舌氏良好的家风和叔向所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而由于晋平公的干预让叔向娶了申公巫臣（在楚时反对子反娶灭陈后所虏美女夏姬，而自己借奉命使齐之机携夏姬奔晋）与夏姬所生女，破坏了羊舌氏良好的家风，最终应验了其母之预言。

叔向之兄羊舌赤在其父死后于鲁襄公三年任中军尉之佐，当晋悼公发怒欲杀魏绛时，羊舌赤力谏之，说“绛无贰志，有事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后魏绛果然呈书欲自杀，晋悼公闻之反而“跣而出”，自称有过，阻止魏绛的自杀，言：“子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sup>[3]</sup> (PP. 929—930) 可以看出羊舌赤的忠正刚直。

叔向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又饱读《诗》《书》等典籍，对以往胜负成败的历史也了然于心。他不但是羊舌氏家族中最杰出的人才，也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备受后人推崇。刘向《战国策书录》：“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sup>[4]</sup> (P1) 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人物分为九等，叔向、季札、晏婴、子产均归于“上中”，属“仁人”之列。<sup>[5]</sup> (P923) 《后汉书·赵岐传》记载：“（岐）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sup>[6]</sup> (P2124) 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人物表》将叔向与郟子、吴季札、楚倚相、晋士文伯、鲁叔孙豹、卫北宫文子、郑子太叔、鲁臧武仲、楚子革等人共列入“文学”一类<sup>[7]</sup> (PP. 2602—2604)。由此可以看出叔向在春秋历史上的地位。

叔向首先是一位德能兼备的政治家。在当时晋国的政治环境下，叔向只能以他的智慧，尽可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晋国在当时的局势中保持优势，以免被强国控制与利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宋向戌发起弭诸侯之兵的会盟活动，盟于宋之时，楚国的子木为了与晋国争盟主的位置，欲衷甲（在衣内着铠甲）以武力击晋。晋国派赵武（赵文子）为代表参加会盟，叔向作为随从参加。赵武

听到楚人的动向之后很是担心，叔向说：

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殫）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则夫能致死。与宋致死，虽倍楚可也，子何惧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sup>[3]</sup>（PP. 1131—1132）

这是说，作为一个匹夫，如果不守信都是要颠扑而死的。本来是为了合诸侯以消除争斗而不守信，一定不能成功。对食言的人，不必忧虑担心！以讲信用之举号召人而用欺骗的手段，再不会有人同他交往。最后他的估计是：晋军能人人尽力抗楚。如宋国也一起抵抗，虽两倍的楚人也能抵挡。他认为，楚人如真正那样做了，反而对晋国有利：提高了晋国的威望，而显示出楚国的不可信任。这一段话，将叔向的思想、政治见解、人格素养等各方面都反映了出来。第一，反映出叔向在政治外交方面所坚守的和好与守信原则。第二，用正当的手段维护晋国在诸侯中的盟主地位。第三，不是借某些事而大肆煽动诸侯国间的怀疑与仇恨情绪，而是在正确认识形势的前提下，尽可能向好的方面扭转。他也估计楚国由于种种原因会放弃原来的打算。果然，盟会中并未出现武力劫持的现象，只是楚国要争先第一个歃血，以显示领先的地位，相持不下。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于晋是因为晋的德行，并不在主盟领先歃血上，叮嘱赵武“子务德，无争先”，反映出他以德信服人的外交思想。

叔向事晋悼公（前 572—前 558）、平公（前 557—前 532）、昭公（前 531—前 526）三朝。这时晋国霸业已衰，政出多门，贵族之家皆崇尚奢侈，而怠于国事。且当时韩、魏、赵三家分掌大权，也并非叔向执政，在此人心唯危之际，要有所作为，必然会引起一些权贵的忌恨，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晋平公十四年（前 544）吴公子季札出聘于鲁、郑、卫、晋诸国，临离开之时嘱叔向：“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sup>[3]</sup>（P1167）所谓“多良”，指“多能人”，是多有掌权的卿士的隐晦说法。“政将在家”指政权将由公室落于卿大夫，正反映出当时晋国的形势。叔向虽然因能力、威望受到晋平公、赵文子、韩宣子的信任，但如在国家大政方面有碍于当政三家之根本利益，则不仅本人性命难保，家族之祸亦立至。所以叔向虽有振兴国家的抱

负，但无法施展。晋悼公之时，叔向因博学“知周之法”而被任命为太子彪（继位后即平公）之傅。平公时多次参与诸侯会盟及作战计划。看来他是将自己为国尽力的方向定在了对外的方面，而回避了执大政者特别关注的内政。这样叔向在同诸侯各国的交往、处理与几个大国的关系上发挥了作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臣子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晋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也就留下了一些辞令之作。

《左传》中记叔向事迹，也是以记言为主，因为对外活动、国与国之间一些问题的交涉，主要看交流、交涉、联络中的辞令，这表面上看起来只是谈问题的一种方式、策略，其实既包括作者在大局上的估计与设想，也体现出作者处理诸侯国关系的原则，自然也反映了作者解决一些复杂、棘手问题的智慧。至于语言的简洁顺畅，引述《诗》《书》等前代文献的恰切和解释的灵活，都堪称先秦散文的优秀篇章。

## 二、叔向的贤者交游

晋叔向、鲁叔孙豹、郑子产、齐晏子、吴季札是同时之人，叔向同这几人都有来往，并且相互间也都抱着钦敬的态度。他们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也有较深刻的政治见解，而且大都在散文、辞令方面留下精彩的篇章，成为先秦时代尤其是春秋时代文章的突出亮点。这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左传》记载了叔向、叔孙豹两人之间的两次赋诗活动。襄公十四年晋平公率领诸侯国军队征伐秦国，至泾水，诸侯军队无意渡河。叔向至鲁国军营见叔孙豹了解情况，叔孙豹赋《邶风·匏有苦叶》，叔向回到晋营就命令士卒准备渡河的船只。鲁国军队果然率先渡河，其他诸侯国军队相继效法，依次渡过泾水。《国语·鲁语下》记载了叔向对叔孙豹赋诗的理解，认为“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sup>[2]</sup>（P183）。襄公十九年晋、齐暂时和解，在大隧盟会。鲁国叔孙豹在柯地会见范宣子，见叔向而赋《邶风·载驰》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表明鲁国想借助晋国力量以自我救助。叔向估计齐国不会因盟会而服从晋国，故说“盍敢不承命”，答应齐国入侵时救助鲁国。叔向、叔孙豹对《邶风·匏有苦叶》《邶风·载驰》之义了然于心，故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真正做到了“善为诗者不说”<sup>[8]</sup>（P507），

“以礼乐相示而已”<sup>[9]</sup> (P1270)。

《左传》记载叔向与子产五次交往。襄公二十七年晋楚弭兵之会后，赵武、叔向等晋国卿大夫自宋返国经过郑国，郑简公在垂陇宴享赵武，子产等七位郑国卿大夫陪同。文中虽未明言叔向，但据赵武、叔向点评郑国卿大夫的赋诗活动的言辞，以及之前“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sup>[3]</sup> (P1129)的先例，叔向应参与了此次宴享，并与子产有接触。襄公三十年子产陪同郑简公到晋国，叔向跟子产询问郑国的政事。襄公三十一年子产陪同郑简公到晋国，晋平公因鲁襄公之丧没有接见郑简公。子产让人拆除诸侯之馆的围墙，以纳聘享之礼物。士文伯诘问此事，子产陈辞。故晋平公厚待郑国君臣，并重修诸侯之馆。叔向评论此事，赞美“子产有辞”，并提出“辞不可以已”的思想观点。昭公元年晋平公有疾，子产赴晋国问疾，叔向跟子产请教国君病因。昭公六年子产主政，铸刑书于鼎，为国之常法。叔向听闻，致信子产。

《左传》记载叔向、晏婴两次交往。襄公二十六年因晋平公扣押了卫献公，齐景公、郑简公赴晋游说，晋平公宴享齐、郑国君，晏婴奉命与叔向交流晋国“为臣执君”、扣押卫献公之事。昭公三年晋平公夫人少姜去世，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请求继续联姻，韩宣子派叔向应对，答应齐国之请。晋国设宴之礼招待晏婴，叔向跟他饮宴，谈论齐晋公室之衰。《晏子春秋》录有10篇晏婴、叔向的问对之辞。

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季札出聘诸国，交接诸国之贤者。至鲁，“见叔孙穆子，说之”，直言其“好善而不能择人”的缺点以警醒，并“请观于周乐”；至齐，“说晏平仲”，建议其“速纳邑与政”以避祸全身；至郑，“见子产，如旧相识”，劝勉子产主政后应“慎之以礼”；至晋，“说叔向”，提醒叔向“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sup>[3]</sup> (PP. 1161—1167)。

季札的辞令不多，但他观乐中论《诗》的文字，可以说是存至今日的最早的《诗》论，成了后人论述《诗经》各部分基本精神与风格，探索诗歌地域与时代特征的重要依据。晏婴因有《晏子春秋》一书，研究者已多。叔孙豹和子产亦有专论<sup>[10]</sup>。叔向也留下了一些辞令和关于《诗》的评论，体现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

### 三、叔向的诗学活动

春秋时期卿大夫阶层在内政外交活动中引

《诗》、诵《诗》是当时风气，尤以鲁襄公、昭公（前572—前510年）时期为甚。《左传》共记赋诗68次，其中在鲁襄公、昭公63年间就达到55次；计引诗177次，在襄、昭二公时期亦高达88次<sup>[11]</sup> (PP. 251—252)。叔向赋诗、引诗等诗学活动是卿大夫阶层诗学活动的组成部分，反映着春秋时代崇诗、用诗的风尚。

#### （一）引诗活动

据《左传》《国语》《晏子春秋》记载，叔向的言辞中引《诗》13次，其中引《雅》诗10次、《颂》诗2次、佚诗1次，皆“信而有征”，贴切恰当，体现了论说的历史依据，增加了说理的权威性与说服力，形成了厚重典雅的文辞风格。

晋国大夫祁奚曾称赞叔向“谋而鲜过、惠训不倦”（《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引诗言说的文学活动基本发生于谋政、惠训的政教礼乐活动中，其引诗、阐诗往往以政教礼乐为旨归，或用《诗》之本义，或根据需要断章取义，不为《诗》文本内容所囿，表现出深厚的学养与诗歌理解、阐发上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写到鲁襄公于当年六月薨，子产随郑简公到晋国，晋因鲁丧之故未设礼仪以见郑简公，“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郑之掌客馆者士匄责备子产，子产堂堂正正一席话，使晋之执政者赵文子认错，士匄也向子产道歉。叔向曰：

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sup>[3]</sup> (P1189)

叔向是说：好的言辞是不可以没有的，子产在晋国的这一篇言辞就是证明。子产说出这一席话来，郑国、晋国关系保持了正常，其他诸侯国也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叔向这里所引为《诗经·大雅·板》中的四句，意思是：言辞有理而意在和睦，人民的关系也便协调（言不引起争斗。辑，和、和顺）；言辞顺达而合于人情，对方能接受，老百姓也安定（杜预注：“莫”犹定、安定）。叔向高度评价子产应对士匄的言辞，强调好的言辞在处理外交关系上的重要性，它甚至关系到两个国家之间是和好还是交恶，从而也关系到两国广大老百姓是不是会有安定的生活。

《左传·昭公元年》写晋楚及列国卿大夫在虢地会盟之后，楚令尹公子围设享礼招待赵武，赋

《大雅·大明》之首章。享礼结束，赵武、叔向分析楚国政事，叔向引《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以周幽王比楚令尹公子围，“言虽赫赫盛强，不义足以灭之”<sup>[12]</sup>（P2021）。他在引《诗》中体现出对在位者道德品质影响其治理能力与效果这一道德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左传·昭公元年》写楚令尹公子围弑郟敖而自立为王，楚右尹公子干出奔晋国。叔向使子干与秦后子享用相同的食禄，赵武认为秦公子富，两人之食禄不应相同，叔向则认为“底禄以德，德均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国，不闻以富”<sup>[3]</sup>（P1224），引《大雅·烝民》“不侮鰥寡，不畏强御”，取“不畏强御”义，显示了他正直的政治品德。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子产铸刑书于鼎，叔向听闻，致信子产。书信中引《周颂·我将》“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以周文王德政与郑国子产铸刑书相比，批评子产铸刑书不合古道。这里显示出子产重视法而叔向坚持周初以来形成的礼仪思想的不同。在今天，我们当然要肯定子产的思想与做法，但历史地看，叔向同子产的分歧，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有关。子产在郑国，郑本小国，处于几个大国之间，只有加强法制、稳定国家、增强国力，才能站得住脚。而晋国虽为大国，但韩、赵、魏都希望通过推行新的法制以尽快替代晋君的地位，所以叔向力求尽可能地保持旧的礼仪制度，以保持国家的安定，同时，他也不希望当时其他国家在法制上大力推进。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尽管叔向对子产很钦佩，两人关系也不错，但他认为那样做并不好，就写信指出，也显示出他的坦荡鲠直。

《左传·昭公六年》载韩宣子出使楚国，楚灵王未举行郊迎之礼。楚公子弃疾赴晋，将至晋国边境，晋平公欲不举行郊迎之礼以相抵。叔向劝谏，辞令中引《小雅·角弓》“尔之教矣，民胥效矣”，言国君行事，对老百姓来说有示范意义，我们不能做不合礼义之事。劝谏晋平公以善人为则，勿效法楚王。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昭公二年》《国语·周语下》中叔向亦引诗以立言明事。以上辞令中，叔向引诗用诗皆不出诗本义之范围。

《左传·昭公八年》载叔向引《小雅·雨无正》“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

巧言如流，俛躬处休”。“巧言如流，俛躬处休”本是讽刺巧佞谄媚小人，但叔向引这几句是说：有时伤心自己不能说，不是舌头笨拙（“出”，借为“拙”），而是自身修养不足，好的能说者，巧妙的言辞如流水一样顺畅，自身也安然而处。杜预注云“巧言如流，谓非正言而顺叙以听言见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征，自取安逸。师旷此言，缘问流转，终于于谏，故以比巧言如流也”<sup>[12]</sup>（P2052），肯定了叔向用《诗》的灵活和局部理解上的恰切。又《晏子春秋·问篇下》载叔向引《大雅·桑柔》“进退维谷”，亦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地引《诗》，需以对《诗》所有诗句烂熟于心、对各句字义有深入了解为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出叔向的学养。

## （二）赋诗活动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公元前546年，郑简公宴享晋国赵武，郑国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子石等卿大夫陪同，赵武说“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sup>[3]</sup>（P1134）。卿大夫登降酬酢、揖让周旋之际，歌诗以类，赋诗言志，他人也可以凭借所赋之诗了解赋诗者的“志”，即所谓“观志”。《汉书·艺文志》云：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sup>[5]</sup>（PP. 1755—1756）

赋诗者“称诗以谕其志”，观志者“别贤不肖而观盛衰”，“观志”是赋诗活动的主要精神。据《左传》《国语》《晏子春秋》记载，叔向虽没有赋诗，但多次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观志者身份参与宴享、私会中的赋诗活动。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齐景公、郑简公亲赴晋国，为被晋侯禁拘的卫献公求情，晋平公设享礼招待，叔向是晋平公的相礼者兼行人。晋侯赋《嘉乐》，赞美齐侯、郑伯。齐侯赋《蓼萧》、郑伯赋《缁衣》，以答《嘉乐》。孔颖达对两君赋诗之志的阐释较为精当，“言晋侯有声誉，常处位，是得宗庙安也”，“欲常进衣服，献饮食，是其不二心也”<sup>[12]</sup>（P1990）。从叔向告晋侯拜二君之辞可知，其对齐侯、郑伯赋诗之意的理解可谓准确。正是叔向居间沟通、协调，促成了送归卫献公之事，成功化解了矛盾。事后叔向说：“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正是对子展的行事、作风和赋诗中所表现的思想的评价。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楚国鬬罢赴晋国参加盟会，晋平公设享礼招待，鬬罢将要退出时赋《大雅·既醉》，以感谢享礼、赞颂晋侯。因诗中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之句，杜预注言：“以美晋侯，比之太平君子也。”<sup>[12]</sup> (P1998) 叔向说“鬬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荡将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sup>[3]</sup> (P1138) 体现出由赋诗看对方之思想、作风的“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思想观念。

由叔向的赋诗活动可以看出，他对《诗经》中的作品可谓烂熟于心，不仅对基于训诂和基于历史背景、创作动机的诗之本义有深入了解，而且对其引申义和局部诗句也能灵活作解，给人以启发。晋叔向、鲁叔孙豹、吴季札都是春秋时代《诗经》的传播者、《诗》学评论家。

#### 四、叔向的言辞观

春秋中晚期，卿大夫们逐渐认识到相互交往中辞令的独立性价值，并对辞令的发表和撰写规则进行了探索。《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子产对晋平公的辞令，《左传》作者引孔子之言：“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sup>[3]</sup> (P1106) 则孔子也认为，晋国在平公之时仍能有霸主地位，同叔向在对外关系中能以正确恰当的辞令消除矛盾、促进合作有关。

首先，表现为叔向对言辞价值的高度认可与充分肯定。《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叔向评论子产的辞令时感叹道：“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叔向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子产虽为弱国之卿，却敢于指斥霸主之国的弊政，辞令正反对比，有理有据，义正辞严，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上卿魏献子述叔向认识郑国鬬蔑的事，叔向说“夫今子少不扬，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sup>[3]</sup> (P1496)，体现了同样的观点。在叔向看来，社会交往中，体现个人内在修养的言辞远比外貌重要。

其次，叔向的言辞观还表现为言辞须合乎礼制。《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国荀跖、籍谈去成周安葬穆后，周景王宴请荀跖、籍谈，并相闲谈。籍谈回晋国后将谈话内容汇报给叔向，叔向评论

说：

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sup>[3]</sup> (PP. 1371-1374)

叔向说“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又说“礼，王之大经也”，可见合于礼制是立言的基本原则。周景王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让籍谈无言以对，然他“一动而失二礼”，实失礼失言，所以叔向批评他“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

《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朝的甘大夫襄与晋国阎嘉争夺土田，晋国梁丙、张趯率领陆浑之戎进攻周朝的颍地，周景王派詹桓伯陈辞晋国。叔向遂劝谏上卿韩宣子：“且王辞直，子其图之。”叔向之所以认为周王之辞有理，是因为他认为晋国大夫率戎狄进攻周朝的行动是“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完全认同詹桓伯辞令中“寇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的批评，肯定詹桓伯辞令表现的尊王攘夷的礼制思想。可见，是否合于礼制是叔向判断言辞有理无理的前提。

叔向言辞观的第三方面是要求“信而有征”。《左传·昭公八年》载，晋国魏榆有石头说话，晋平公咨询师旷，师旷借着解释奇怪的石言现象而进行规谏，叔向评价：

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谓乎！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sup>[3]</sup> (PP. 1300-1301)

师旷将石言归因于“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讽谏晋平公修筑鹿祁之宫的事，体现出政治理性和人文精神。叔向认为师旷的劝谏辞令“信而有征”，并引诗称赞其“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信而有征”，“信”指言辞要表达真实的内容与情感，“征”即证明、证验，一求证于前代文献，二合于眼前的社会事实。宫殿建成，百姓疲惫，诸侯从而叛之，是立马可见之事。

叔向是以政治教化活动为立足点来思考言辞的价值和规律的。“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在立

言、事功的互动关系中强调了言辞的独立性价值。言辞须合于礼制、“信而有征”的思想，是对发布、撰写言辞的基本要求。言辞要“信”（即要有真实的内容和情感），要合乎礼制，是对言辞思想内容的明确要求。在撰写形式技巧方面，要“考典”，要“有征”，有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供参考，有前代贤达的论说为依据，但须以立言之本——“信”和合于礼制为前提。可见，在言辞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方面，叔向在关注言辞形式的独立审美价值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言辞的主导思想。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这是针对周天子而言，礼不再是维护宗法统治的工具，但它毕竟是社会交往的规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礼随着社会发展有所调整、变化之后仍然存在于春秋各国。《左传》中“君子”经常讨论“礼也”、“非礼”、“知礼”、“有礼”的界限，其论“礼”多达462处<sup>[13]</sup>（P16）。可见，礼是卿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识和价值共识。叔向崇礼思想是春秋时代礼治思潮的体现，体现了在社会巨变中一些思想家希望尽可能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诉求。叔向主张言辞要合乎礼制，从言辞的思想内容方面提出了要求，实际上也包含着言辞要有时代性、现实性的观念。

## 五、叔向的辞令

《左传》《国语》等史书常用对话、陈辞的方式录入历史文献。刘知己《史通·申左》中说：

《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谏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本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哉？<sup>[14]</sup>（P391）

刘知己揭示了《左传》记言的历史真实面貌，可以说《左传》《国语》中相当一部分对话、陈辞是独立文章。赵逵夫《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一文说：

见于《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的一些篇章，因前后被加上了叙述背景和事件结果的文字，虽当中有大段完整的文字，但无篇名，亦无“上书”、“寄书”、“辞”、“赞”等字眼，过去多视为记者所写或小说家言，不看作论说者的文章，今其中凡结构完整、语言凝练、显然为书面文章者酌情收录，使文归其主。<sup>[15]</sup>

认为《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辞令是论说者的文章。因而，《左传》《国语》中的叔向行人辞令、政论文辞、论谏文辞应是据历史文献裁录的，著作权实属于叔向。

春秋晚期，叔向的言辞、事迹已流传于世，尤其是言辞作为嘉言善语已开启了经典化的过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叔向认识骊蔑之事：

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曰：“辛来！昔叔向适郑。骊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骊蔑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汝）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扬，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汝）。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sup>[3]</sup>（PP. 1491—1496）

贾辛曾参与平定东周王室的王子朝之乱，“有力于王室”，故被魏献子（魏舒）任命为祁县大夫。魏献子引用叔向认识骊蔑之事，意在说明自己重用贾辛的原因。《左传·昭公十五年》荀吴说“吾闻之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哀公十七年》赵简子说“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新序·杂事四》赵襄子说“吾闻之于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由此可见，叔向的言辞在当时上层社会中广泛传播，也对一些执政者接人理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古文选本兴起之后，叔向的辞令又作为有独立文体的文章被收入各类选本，成为古文家揣摩学习的古文范本。明王鏊说：“于时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产、叔向、叔孙豹之流，尤所谓言而可法者。”<sup>[16]</sup>（P604）“言而可法”说明了叔向等人辞令的特点与价值。

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在辞命、议论文体下收录叔向辞令6篇：《晋叔向论铸刑书》《叔向贺韩宣子忧贫》《叔向论楚令尹不终》《晏婴叔向论齐晋》《叔向论楚克蔡》《叔向论楚子干得国》。

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在论谏文体下收录4篇：《贺韩宣子忧贫》《与叔向论齐晋》《论楚子干得国》《与叔向论娶》。

刘祜《文章正论》收录6篇：《叔向誉单靖公》《叔向以德示赵文子》《叔向不患楚衷甲》《晏婴叔向论齐晋》《晋叔向诒子产论铸刑书》《叔向议狄》。

张以忠《陈明卿先生评选古今文统》收录2

篇：《晋叔向论铸刑书》《叔向贺宣子忧贫》。

葛肅、葛肅《古文正集》收录4篇：《齐请继室于晋》《郑人铸刑书》《叔向论周复兴》《叔向贺韩宣子贫》。

钟惺《周文归》收录3篇：《晏子叔向论齐晋之衰》《晋叔向诒子产论铸刑书》《叔向贺韩宣子忧贫》。

金圣叹《才子古文》收录4篇：《晏婴叔向相语》《叔向许子皮朝楚》《叔向贺穷》《董叔得系于范》。

清代《御选古文渊鉴》收录2篇：《晏婴叔向论齐晋》《叔向见韩宣子》。

《古文观止》收录1篇：《叔向贺贫》。

余诚编《古文释义》收录1篇：《叔向贺贫》。

《墨子·非命下》说：“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行政者也。”<sup>[17]</sup>（P175）叔向的辞令亦“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行政者也”，是典型的经世之文。《左传》《国语》记载了叔向的辞令30篇，《说苑》收录5篇，数量可观。据文体功能分类，有外交辞令、政论文辞、论谏文辞。从辞令风格而言，各体风格鲜明，也呈现出“信而有征”的共同特征。以下分体一一叙述。

### （一）外交辞令

叔向为上大夫，任晋平公太傅，熟稔典籍，娴于辞令，常兼任行人之职。不仅他的外交辞令为其所撰，晋国其他行人的外交辞令也可能经他润色、审定。其外交辞令，以维护晋国霸主地位为出发点，针对具体外交环境和任务，风格多变，各臻其妙。

叔向认为使臣的外交活动要“守之以信，行之以礼”<sup>[3]</sup>（P1267），当诸侯国外交行为不合礼制时，其外交辞令既含蓄而又明确，曲尽其意。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晋平公去世安葬后，到晋国吊唁的诸侯大夫执意拜见新君，叔向代晋昭公为言，婉言谢绝，说：

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经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sup>[3]</sup>（P1319）

其辞以假设立意，设想晋昭公接见时选穿礼服的两难之境，以设问收束，表面似咨询诸侯大夫之意见，实暗示在丧期拜见新君之要求不合礼制，绵里藏针，故诸侯大夫“无辞以对”，知难而退。

当诸侯国尊重晋国的霸主地位，勤行示好之时，其外交辞令就语气平缓、委婉雅重。鲁昭公三年七月，郑国罕虎到晋国，祝贺晋侯娶正室，并陈述郑国在朝贺楚灵王之事上进退维谷的窘境。晋国韩宣子派叔向应对说：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实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sup>[3]</sup>（P1241—1242）

认为郑国只要对晋国忠心耿耿，即使依照晋楚弭兵之会的盟约行事，朝贺楚灵王，晋国也完全理解、支持郑国的举措。辞令正反对比，反复陈述，委婉周详，刚柔兼济，极尽安抚之能事。金圣叹《才子古文》卷二收录此段外交辞令，点评说：“段段真挚，段段铿锵，段段缜密，段段疏越。”<sup>[18]</sup>（P54）可谓准确。同年，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请求继续联姻，叔向的应对之辞也有相近的风格，多用套语，文辞典雅。

在晋国霸权衰落，诸侯有挑衅之意时，其外交辞令就立足公义，据理而言，剴切凌厉。昭公十三年，晋国乘楚国内乱，尽起军队四千乘，邀合诸侯于平丘，以示威诸侯，重修旧盟。邾国、莒国起诉鲁国侵扰不断，晋国于是拒绝鲁国参会，子服惠伯争辩，叔向说：

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僂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忧，其庸可弃乎？若奉晋之众，用诸侯之师，因邾、莒、杞、郕之怒，以讨鲁罪，间其二忧，何求而弗克？<sup>[3]</sup>（P1357）

以武力和鲁国内乱为契机，威慑鲁国，体现了晋国示威诸侯、急修旧盟的既定策略。事功为上，杂用王道霸道，善用比喻，形象生动，词锋凌厉，不可阻遏，故“鲁人惧，听命”。平丘之会时，齐国不愿结盟，叔向应对之辞说明晋国重修旧盟之举的意义，点明齐国不结盟约之弊，词采华茂，意旨显豁。

### （二）政论文辞

春秋政论文辞生成于春秋礼治的议政制度<sup>[19]</sup>。叔向是晋国核心政治人物之一，参与晋国政事，又多闻知列国人事，《国语》《左传》等多载其政论文辞。他谙知为政之道，熟悉列国和世族的历史掌故、典籍，他的政论文辞反映了其崇礼、重德、尚民、慎言的思想，评论政治事件，指明其发展趋



势；点评政治人物，预测其盛衰祸福。出于公心，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为后代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

叔向的政论文辞具有鲜明的议论文文体特征。常一人一事一议，或短章，或长篇，围绕中心，有序展开，条分缕析，透彻缜密。昭公十一年九月，鲁国安葬齐归，昭公不悲痛。叔向得知后，说：

鲁公室其卑乎！君有大丧，国不废蒐；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无戚容，不顾亲也。国不忌君，君不顾亲，能无卑乎？殆其失国。<sup>[3]</sup> (PP. 1326—1327)

先提出鲁“公室其卑”的判断，然后从“国不废蒐”、“君无戚容”两事分析鲁国政治形势，水到渠成地得出“能无卑乎”的结论。立论如城，坚不可摧。《国语·周语下》载周景王十四年，叔向聘周，单靖公宴享、赠饯、欢送俱合礼有德，叔向认为“今周其兴乎！其有单子也”，引史佚之言，褒美单子“居俭动敬，德让事咨，而能避怨”；阐发《周颂·昊天有成命》之义，称赞单子在席间解说此诗所表现出来的诗学修养，其德行与此诗“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之成德相应；又引《大雅·既醉》之六章，说明单子能“不忝前哲”、“广裕民人”，故必有“章誉蕃育之祚”。这是一篇精彩的人物评论，计466字，征引语类文献“史佚之言”、《大雅·既醉》，畅论单靖公之德，言之有物，情理并茂。

昭公六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与子产之前多有交往，非常赞赏子产的德行、才干。子产铸刑书之事对其冲击很大，故他致书子产。这篇299字的书信首尾完整，是典型的政论文。将以礼治民与专任刑书正反对比，陈说专任刑书之弊；多次征引《诗》《书》《礼》及语类文献，增强说服力；四字句式排比，杂以长句，整散结合，颇具气势；说理抒情兼胜，颇能表现叔向政论文辞的风貌。

叔向的辞令多引《诗》《书》《礼》及语类文献，善用比喻、排比等修辞，句式长短整散相间，富于文学价值。叔向政论文辞引《诗》9次、《书》1次、谗鼎铭1次，称引“闻之曰”“史佚之言”等语类文献4次，间接引用礼类文献、陈说先王先贤事迹不一而足。多用比喻说理，使形象具体可感、道理通俗易懂。论百姓不乐晋国政事，则说“民闻公命，如逃寇仇”<sup>[3]</sup> (P1236)；论楚灵王杀蔡侯、灭蔡国，将受灾祸，则说“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sup>[3]</sup> (P1324)；论

中行氏施政不良，将先亡，则说“譬之其犹鞞革者也，大则大矣，裂之道也”<sup>[20]</sup> (P144)。

### (三) 论谏文辞

春秋论谏文辞产生于春秋礼治的讽谏制度。“春秋时期，本属‘古制’的讽谏制度因现实政治所需而日趋完善，由于此时政治理性的高扬，使谏辞也成为一种使用频率很高的文体。”<sup>[19]</sup>叔向曾任太子彪的傅，继任太傅，匡君之过、矫君之失本是太傅职责所在；又是晋国上大夫，常辅佐上卿为政，拾遗补缺，自不待言。《左传》《国语》《说苑》收录叔向论谏文辞9篇。从讽谏对象而言，以晋平公为对象的论谏文辞有6篇，以范宣子、韩宣子为对象的论谏文辞有3篇。规劝、讽谏的方式很多，《孔子家语·辨政》云“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谏，二曰戇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sup>[21]</sup> (P97)。贵在因人因时制宜，使对方从谏如流。吴国季札评价叔向说“吾子好直”（《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子亦说“叔向，古之遗直也”（《左传·昭公十四年》），故其论谏之辞，直谏为主，谏、讽谏次之。

其直谏之辞，往往开篇表明态度，引证古制，称引典籍，指明危害，一语道破，虽短篇亦有可观之处。昭公六年，楚国公子弃疾到达晋国，因韩宣子聘问楚国时，楚灵王未郊迎，故晋平公拟不举行郊迎之礼，叔向直谏曰：

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书》曰：“圣作则。”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sup>[3]</sup> (P1297)

先点明不郊迎的实质是效仿楚国的失礼之行，继而称引《诗》《书》，反复陈说“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篇终以“匹夫为善，民犹则之”暗示盟主为善，必成为诸侯效法的榜样。着眼大局，立意高远；多用反问句式，启人深思；“言而有征”，文风典雅。昭公二年，规劝晋平公送还齐国上大夫陈无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苑·贵德》载叔向谏晋平公春天筑台，古今对比，述说春天筑台之弊。《说苑·正谏》载叔向由吴国之事谏晋平公筑驰底之台（《左传》作麇祁之宫），因势利导，振聋发聩。

其谏之辞，欲擒故纵，曲径通幽，让人幡然醒悟。《国语·晋语八》载叔向谏晋平公杀竖襄，云：

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鵀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sup>[2]</sup> (P427)

引用旧事，反语作结，曲尽其意，表现出了高妙的谏诤艺术。

其讽谏之辞，委婉含蓄，引古喻今，能动听者之心。《国语·晋语八》载叔向贺韩宣子忧贫，是一篇典型的论谏之辞，计205字。名贺实谏，立意别致；叙栾氏、郤氏兴亡，寄寓贫而能德则兴、富而骄泰则亡之意；结篇点题，表明祝贺之由，揭示儆戒之旨。当头棒喝，使人警醒，故韩宣子“拜稽首焉”。《国语·晋语八》也载叔向讽谏范宣子之辞。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久而未决。此事关乎晋国政局之安危，叔向劝其咨询家臣訾祐，引古制“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刑，而访谘于耆老，而后行之”以说服他<sup>[2]</sup> (P424)。文辞虽短小，却用意缜密，引古证今，粲然可观。

## 六、结语

叔向的文学活动是春秋卿大夫文学活动的一部分，对考察春秋中晚期文学活动有典型意义。

春秋中晚期，卿大夫成为文化、文学活动的主体。特定的时代氛围激发了政治地位空前提升的卿大夫对自身主体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思考。叔孙豹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尤其是立言不朽的思想，反映了卿大夫“对话语权力的追求和主体意识的觉醒”<sup>[22]</sup>。因着从小普遍接受贵族教育和家族文化熏陶，一部分杰出的卿大夫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当卿大夫们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立言不朽的文化价值追求、波谲云诡的政治活动相结合时，以“立言”为核心的文化、文学活动就产生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堪称一时

之选的卿大夫，如晋叔向、鲁叔孙豹、郑子产、齐晏子、吴季札，互相欣赏，书信往来，赋诗言志，议论政事，俱以高风亮节和善于辞令而闻名当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松散的文化群体。春秋中晚期卿大夫们的文化、文学活动是战国诸子著书立说活动的上源，开屈原、宋玉等战国卿大夫创作的先河。

叔向引诗、赋诗的诗学活动是春秋中晚期诗学的组成部分，让我们看到了诗学活动在卿大夫阶层广泛的影响力。以《诗》为中心的引诗、赋诗等诗学活动，是《诗》的文学传播方式，也是强化《诗》的权威性、经典性的文学实践，其对《诗》的整理、编辑、传播和经典化意义重大。可以说《诗》的经典生成是春秋中晚期卿大夫诗学活动的重要成果。

诸侯国卿大夫活跃于各种政治场合，发布、撰写言辞的能力受到当时上层社会的普遍重视。叔向的言辞思想，就生成于春秋中晚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既反映着卿大夫的共识性认识，也是个体文化、文学活动的经验总结。叔向的言辞观是政教功用论文学思想的先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突显了言辞在政治实践活动方面的作用，与孔子的“兴、观、群、怨”文学功用观有一定联系，是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论思想的源头。言辞须合于礼制的观念孕育了儒家“止乎礼义”文学思想，“信而有征”开启了古代文学明道、宗经、征圣的文学话语模式。

叔向的外交文辞、政论文辞、论谏文辞多是其内政、外交中撰述活动的产物，文思兼善，辞采华茂，多数篇章结构完整，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学价值。春秋晚期，叔向的言辞已作为嘉言善语流传于卿大夫阶层。古文选本兴起后，其文辞又被选入各种选本，成为古文家推崇的范本。

## [参考文献]

- [1] 钱穆. 国史大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 徐元诰. 国语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3]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4] [汉] 刘向集录, 范祥雍笺证, 范邦瑾协校. 战国策笺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5]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 [宋] 范晔撰, [唐] 李贤等注. 后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7] [清] 顾栋高辑, 吴树平、李解民点校. 春秋大事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8] [清] 王先谦撰,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9] [清] 孙希旦撰,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0] 赵逵夫. 叔孙豹的辞令、诗学活动与美学精神 [J]. 文学评论, 2007, (4); 韩高年. 子产生平、辞令及思想新探 [J]. 中原文化研究, 2019, (3).
- [11] 俞志慧. 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12] [晋] 杜预注, [唐] 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 [M]. 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13]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4] [唐] 刘知己著, [清] 浦起龙通释, 王煦华整理. 史通通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15] 赵逵夫. 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5).
- [16] 凌稚隆. 春秋左传注评测义 [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26 册 [C].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17] 孙诒让. 墨子闲诂 [A]. 诸子集成 (第 4 册) [C].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
- [18] 张国光点校.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 [19] 韩高年. 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 [J]. 文史哲, 2018, (1).
- [20] [汉] 刘向编著, 石光瑛校释, 陈新整理. 新序校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21] [清] 陈士珂辑, 崔涛点校. 孔子家语疏证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
- [22] 过常宝, 高建文. “立言不朽”和春秋大夫阶层的文化自觉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4).

## Family Tradition of the Yang—She Cla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History of Shu—Xiang’s Literary Activities

ZHAO Kui-fu, TIAN You-yu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Shu-Xiang of the Jin State is well-known for his erudition and diction, and his literary activities are recorded in *ZuoZhuan* and *GuoYu*. He was good at composing and quoting poems, and his poetic activities helped to produce the classic Poetry. Shu-Xiang’s view of diction is embodied in his ideas, such as “to draw diction”, “to conform with the ritual system” and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His ideas are the forerunners of Confucian literary ideas of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 Shu Xiang’s diplomatic, political and admonition rhetoric had high ideological and literary value.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of the senior official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represented by Shu-Xiang, were the source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scholars in Warring State period, and also a historical precedent for the activities of Qu Yuan, Song Yu and other poets.

[**Key words**] Shu-Xiang; the senior officials; di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history

(责任编辑 周蓉/校对 小舟)